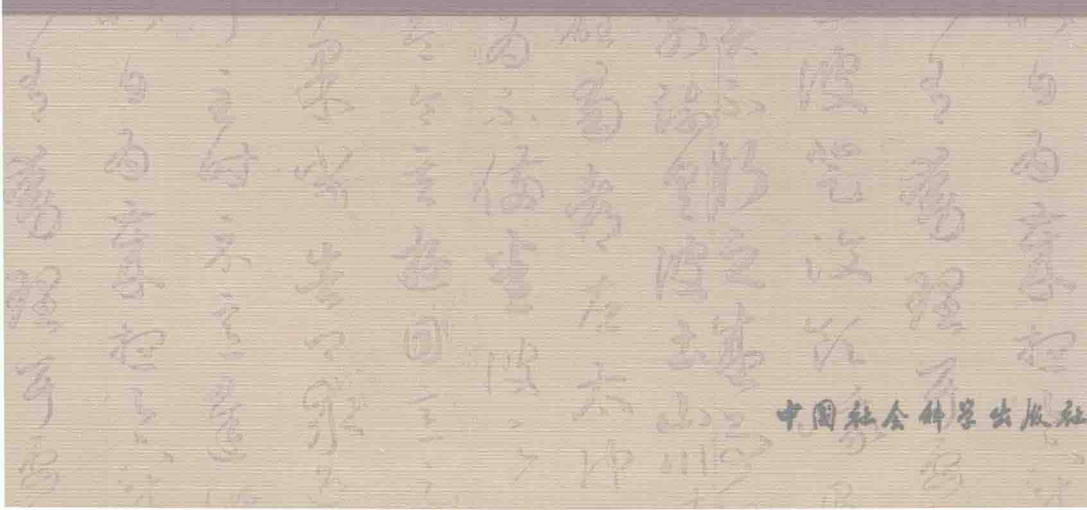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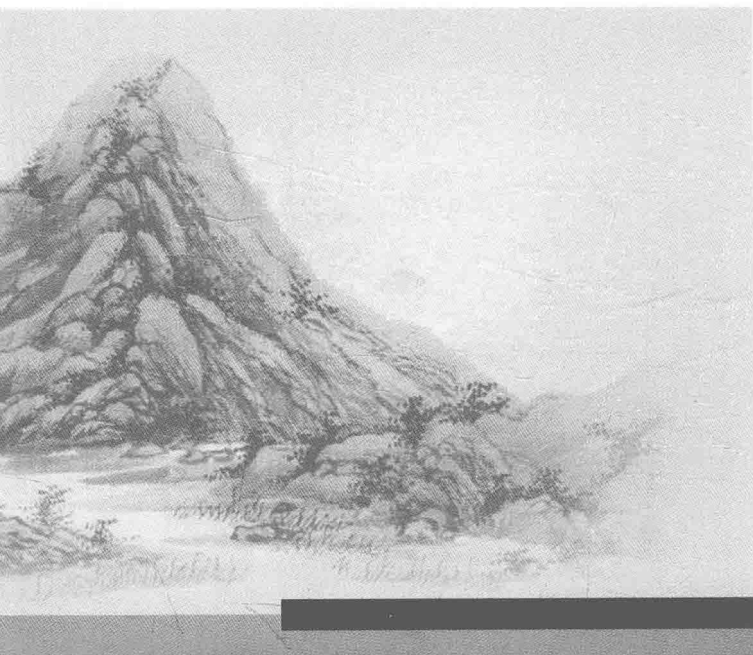
宋词与地域文化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Ci and Regional Culture

陈未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词与地域文化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Ci and Regional Culture

陈未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词与地域文化/陈未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61-7281-0

I. ①宋… II. ①陈… III. ①地方文化—影响—宋词—文学创作研究—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09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特约编辑 孙洪波
责任校对 石书贤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4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福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项目批准号 : 14HQS11)

序 一

杨海明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诗经》十五国风即是依据地域加以分类的，《楚辞》的命名也浸润着浓郁的地域色彩。此后历代作家的实践不断展现出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而从《左传·季札观乐》论各国风诗始，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江山之助”、《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再到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论述，也在理论层面丰富了人们对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进入21世纪，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地域文学文献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地域文学史的著作大量问世，“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逐渐成熟。这是文学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的确，运用地域文化的视角解读文学，可以有许多富有意味的发现。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试论唐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学术月刊》1984年第1期）、《试论唐宋词中的“南国情味”》（《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等论文，即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诠释唐宋词文学现象，从而揭示唐宋词与南方地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当然，我的论述只是一个尝试，唐宋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尚有许多值得开拓的学术空间。值得高兴的是，陈未鹏博士的这部《宋词与地域文化》，在地域文学理论和唐宋词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是书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但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第一，它对地域文化的概念加以拓展和深化，提出了地域文化类型的概念。作者认为，地域文化不一定只能依托于某个具体的地域，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的地理单元也可能孕育相同的地域文化。作者以“都市”为例，认为词体的产生与发展，与都市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互动。第二，作者将动态性

的视角引入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之中。当时代推移情境变迁,会使得原有的地域文化产生变更,而当词人游历于不同的地域之间,又经历着不同地域文化的转换。地域文化的变更转换,往往引起创作的新变。作者的研究,是对此前学术界习惯于对地域文化作静态性的描述与考察的一种深化。第三,作者不仅关注地域文化对于宋词的影响,也关注宋词反作用于地域文化的一面。作者将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细化到具体的文体(宋词)加以研究,辨析不同文体与地域文化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关注宋词在构建地域文化方面的作用与价值。因此,就整体上看,本书有着勇于开拓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

当然,宋词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陈未鹏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是地理学专业,硕士博士专业均是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的学习经历,酝酿出《宋词与地域文化》的学术成果。期待陈未鹏博士能以《宋词与地域文学》的出版为起点,继续努力,扎实稳健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道路。

序 二

陈庆元

在号称“八闽”的福建，“八闽”之一的莆田有点特别。唐五代之前，现在的福建只有“七闽”，北宋建立兴化军，始有“八闽”之说。宋称兴化军，元改兴化路，明清一直叫莆田府，与其他各府平起平坐，其辖区，基本上就是莆田、仙游两县，大约就是现在莆田市的范围。1911年至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莆田、仙游两县的行政归属，变化多端，鼎盛时称莆田地区，治所在莆田县，把闽清、永泰、福清、长乐、平潭诸县都划过来；最可怜的时候，“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专区被撤销，莆田、仙游两县归到泉州地区去了。转来转去，过了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莆田、仙游又回到宋元明清的基本建置，即在两县的基础上建立莆田市。今天的莆田市虽然下属的“县级”单位多了，但仍然不出莆、仙两旧县的区域。

行政区的划分，固然有自然地理的因素，如以山、河为界，但是文化地理的因素也很重要。宋代莆、仙有三绝：子鱼、西施舌、十八娘。子鱼，产于江口，又称“通应子鱼”或“通印子鱼”，其肉细嫩；西施舌，产于近海的一种蚌类，其肉细滑；十八娘，荔枝品种之一。宋代文人对此三绝津津乐道，诗文别集和笔记都有载述，莆人也引以为豪。明朝诗坛领袖之一的王世贞赠莆田诗人畚翔诗云：“十八娘红产荔枝，蛎房舌嫩比西施。更教何物称三绝，为有畚郎七字诗。”王世贞把畚翔诗与十八娘、西施舌并称为“三绝”，是对畚翔七绝的赞赏。王世贞以畚翔易子鱼，似乎子鱼已不再闻名了吧？其实不然，王世贞为了运用莆田“三绝”之典以赞畚翔，只好三者弃去一。晚清，莆田诗人宋廷尊《通印港》诗云：“且赏故乡风味好，荻花秋雨子鱼肥。”“子鱼”并没有消失。子鱼、西施舌、十八娘，是该地物产，连绵千年，依旧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成了地域文化的特征。

中国方言区，闽居其二：闽方言和客家方言。但是闽方言又是五花八门，细分为闽南、闽东、闽北、闽中，莆仙话东南北中都不属，就叫莆仙话。莆仙话，闽南人听不懂、福州（闽东）人也听不懂。明代莆田作家姚旅写了一本《露书》，其《风篇》说，莆语异于中原，但又保留部分古音古字，又说莆语某些土语如“打敌都”（谓刁器之难制者）等，“不知所解，亦不知所本”，我曾摘录数条与莆生消遣，连他们自己都忍俊不禁。依我推测，1911年以来数十年间，莆仙的行政单位、归属变化无绪，最后还是回到宋元明清的基本建制，一方面是行政区有它的历史稳定性，另一方面，莆、仙二县的特殊方言可能也起了重要的维系作用，把莆仙归到泉州，别扭；莆田专区（市），把讲闽东（福州）方言的闽清、永泰、福清、长乐、平潭纳进来，也别扭。

莆仙科举兴盛，这么小的地盘，不多的人口，兴化一府只辖二县，历代却出了两千多名进士，往北，堪同福州府比肩；往南，也不比泉州逊色，而超越汀、漳、建等州。唐代“九牧林”之说，流传已久；不经意间，“九牧”成了著名商标，可能还遗存着科第官宦的密码。我曾为台湾兰台出版社审过《明清科考墨卷集》的书稿，莆田观察里第旧主人（九牧后人）搜集明代至晚清数千份科考试卷，以供子孙研习之用，用心之良苦，令人叹为观止！科举制度已经消失一百多年，时至今日，一说起莆仙，大家马上想到莆仙人勤学苦读。前十年，我们一位莆仙学生报考复旦王水照先生的博士，面试时一口气背了好多篇刘克庄的诗，过后王先生对我说，他喜欢福建（莆仙）的学生，他们爱读书，会读书。

古代社会，除了颠沛流离或居无常所的极少数人，他们从出生到成长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地域的文化在他们的一生无疑会打下不可磨灭印记。如果这个人 not 游宦他乡，不外出经商行贾，甚至没有出过远门，老死于乡里，也就是说，终其一生，他只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之中生活，只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活，他的地域文化印记也就只有一个。有些人有科举功名，或其他原因，成人之后不断地变换居所，他所经历的，可能是多个地域，生活在两个以上的地域文化环境氛围之中，但是，他的原乡（出生和生长地）的文化可能长久地留存在他的记忆和生命之中，所谓老大还乡，“鬓毛衰”而“乡音无改”就是这个道理。

未鹏就是属于王先生说的爱读书会读书的莆田人。他的《宋词与地域文化》二十万言即将出版，嘱我作序。初读书稿，很兴奋。此书讨论

的是宋词和地域文化关联的问题，因此我首先想到莆仙的地域文化。莆仙文化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之外，还有莆仙戏、妈祖信仰，莆人性格耿直等。我们讲地域文化，应当抓住地域最主要的特征，而不是泛泛地谈勤劳勇敢、海边邹鲁之类。研究宋词与地域和文化间的关联也是如此。到底宋词的地域文化的最主要特点在何处？杨海明先生曾经很精辟地论述过词是江南都市文学的形式。未鹏顺着这一思路，认为宋词的地域文化特质，一是南方文学，二是都市文学，都谈到点子上了。

讨论宋词的地域文化，两宋之际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切入点。宋代和唐代不大一样，唐代没有“北”“南”之分，也就是说，南宋的疆域已经比北宋大大缩小，淮河以北已经为金所有，不少士人千方百计南奔。南奔的词人有两类，一类是北方人来到南方，另一类是原本在北方仕宦又回到南方。北方人来到早先不太熟悉的南方，所居地的变迁，文化环境与北方的差异，到了南方的北方人一方面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则眷恋故土和家园。那些长期仕宦在北方的南方人，对他们来说是“南还”，但是这种南还却充满了苦涩，因为这时国家只剩下半壁江山了，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北方的记忆。所以，不论北方人南来，还是南方人南归，都存在一个地域转换的问题，存在着地域文化环境变化的问题。从北宋演化为南宋，由北方转变成南方，时间和空间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无疑影响到词的创作。

作为南方都市文学的词，杨海明先生认为宋词有它独特的意象，例如“水”，又例如“柳”，在宋词作品中大量出现。未鹏研究宋词，从地名入手：江南、杭州及西湖、苏州、金陵、扬州及平山堂。江南一词，隐藏着十分丰富的地域文化密码：杏花桂树，莺鸣燕飞，春雨草长，烟柳画桥，湖光山色，晓风明月，亭台楼榭，檀板红袖，诸多的密码经过词人的取舍组合，就产生了柔媚的、软款的、多情的甚至是香艳的宋词。江南文化密码，造就的要眇宜修的宋词；要眇宜修的宋词，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江南的地域文化。“金陵”一词的文化密码也很丰富。金陵作为六朝古都，号称佳丽地、帝王州，其地有秦淮河、桃叶渡、蒋山青溪，华林旧园，宋词的描绘都没有缺席，而未鹏却选取了“怀古”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元素作金陵地域文化的研究点。不错，金陵曾经是六朝古都，繁华一时，但是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痛苦，歌舞的背后却有眼泪，东晋至宋齐梁陈先后对峙的是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东晋丢失北方山河之后，南方政权

仍然不断受到北方侵扰。这是金陵的历史记忆，也是金陵的文化记忆，从北宋开始，词人的作品就不断浮现这一段记忆。南宋与金的对峙，词人更是以金陵怀古文化来浇他们心中的块垒。未鹏的论述，使人信服。三年的苏州求学生活，让未鹏对苏州这座江南古城产生了感情。我一向认为，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者必须亲践其地，感受领悟其地的风土语境。《宋词对地域文化的选择性表述》一节，未鹏以苏州为例，选择垂虹桥和姑苏台两处加以论述，前者论隐逸题材，后者论渗入了隐逸内容的怀古主题，进而讨论宋代苏州的繁华与“繁华主题”在宋代苏州词中缺失的原因。作者认为“宋词对地域文化的反映也是有所选择的”，宋代词人于杭州选择其繁华的都市文化，于金陵选择其历史的怀古文化，于苏州则选择隐逸主题。

研究宋词流派，较多地从词的风格入手。未鹏论述流派，则“引入地域文化的视角，考察地域文化对宋词流派的发生、发展和特征的影响”，这一尝试是有益的。首先，本书论述流派并非面面俱到，而只选择了江西一地进行论述。我们可以体会到未鹏的良苦用心，因为宋代江西词人的人数仅次于浙江，在全国排第二位，欧阳修、姜夔都是江西籍的大词人；其次，江西是南唐旧地，词的创作有其传统；再次，宋诗中有江西派，从文体上说诗与词是两种不同文体，但诗、词也有相通之处；又次，作为辛派词人的辛弃疾曾为官江西、隐居江西；最后，江西是宋遗民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作为地域文学，江西词人群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未鹏本科读的是地理系，硕士博士读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我认为这种学科交叉的求学经历也不错。未鹏师从词学专家杨海明先生治宋词，在选题时发挥了他地理学科的优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宋词与地域文化》即将出版，祝贺他！相信此书能引起词学界的重视。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提倡学科交叉，但是有的单位在录用人才的时候，却强调本、硕、博三个阶段都必须同一专业，认为这样基础才会好，知识才会牢靠，这些单位政策的设计者，假如你能读懂未鹏这部书的话，结论又将是如何呢？

莆田地域文化很独特，我不是莆田人，上文所说莆田某些文化特征，隔靴搔痒，可能未触到痛快处。未鹏是莆田人，我期待未鹏能做出一个莆田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莆田文学的课题，例如刘克庄，不知吾家未鹏以为可行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地域文化—文学思想概述	1
第二节 西方的地域文化—文学思想概述	11
第三节 近代以来中国的地域文化—文学研究	19
第四节 宋代文化—文学地域性特征	49
第五节 本书的思路、内容及研究方法	55
第一章 宋词的地域文化特质	60
第一节 南方文学：宋词的地域文化特质之一	60
第二节 都市文学：宋词的地域文化特质之二	74
第二章 地域文化转换变迁与词的创作	99
第一节 地域文化空间转换与词的创作	99
第二节 地域文化时代变迁与词的创作——以镇江为例	131
第三章 地域文化与宋词流派——以江西为例	145
第一节 南唐词风与北宋前期江西词派	148
第二节 江西诗派的词作及词论	159
第三节 江西南渡词人、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173
第四节 南宋江西遗民词人	184
第五节 江西词派的总体特征与江西地域文化的关系	204
第四章 宋词中的地域文化表述	221
第一节 宋词中的地名：最直观的地域文化表述	221

第二节 宋词中的山水：作为自然的地域文化表述·····	234
第三节 怀古词：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表述 ——以金陵为例·····	241
第四节 宋词对地域文化的选择性表述——以苏州为例·····	259
余 论·····	274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85

绪 论

本书所述地域文化，概指依托于某个特定的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征鲜明、性质相对稳定的文化。在开始“宋词与地域文化”研究之前，先来回顾前人关于地理与文明、人地关系以及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

第一节 中国古代地域文化—文学思想概述

虽然缺乏体大思精的专门著作，但中国古代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思考却非常丰富，分别散见于专门的地理学著作，正史的地理志，地方志，类书中的地理门类，此外，别集、总集以及选集中的序跋、地纪、地赋、游记文学、行旅文学以及人物传记（碑、传、墓志铭等），笔记、诗话、词话、文话等，亦有零散而珍贵的论述。

专门的地理学著作有《尚书·禹贡》《水经注》《读史方輿纪要》等。其中关于人地关系思想的论述，以及关于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有指导意义。正史地理志的体例由东汉班固《汉书》所开创。《汉书·地理志》记述了全国的政区设置、沿革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民俗和经济发展状况。此后，《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等正史地理志，记载了中国自西汉迄明各朝行政区划的建制，有的还兼及其区划沿革以及境内自然地理环境、古迹名胜、物产交通、风俗民情。在客观的记载中隐含着历代史官对地域文化的深刻把握，反映了时代的认知水平。中国地方志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

两汉六朝隋唐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宋元时趋于完备，明清时臻于鼎盛。地方志的撰述本身就反映了地域文化意识的成熟。而地方志中关于地域山川物产、风土人情、乡贤人物的记述，亦是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此外，文人别集、总集中许多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零章散句、只言片语，也颇为精彩。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关于地域文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阐发，即探讨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二是南北地域文化—文学差异现象的记述与分析。

一 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理论阐发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于风俗民情的巨大影响，而生活于其间的人的性格，气质与心理亦受到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的濡染。如《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①即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民风习俗的决定性作用。又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②所谓的“居”、“养”在一定程度上即指人的外在环境。这种“人性皆同，居使之异”的观点，荀子也有类似表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③所处的地域文化对人的性格、行为习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相近的论述还有《管子·水地》：“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洿，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洧取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戇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④《淮南子·坠形训》：“土地各以其类生……（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⑤《国语·

① 《礼记·王制》，引文见《礼记正义·王制》，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

② 《孟子注疏·尽心上》，《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86页。

③ 荀况：《荀子集解》，王先谦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4页。

④ 管子：《管子·水地》，引文见《管子校注》，黎翔凤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1页。

⑤ 刘安：《淮南子·坠形训》，引文见《淮南子集释》，何宁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页。

鲁语下》：“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①而司马迁《史记》更是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思想。^②《史记·货殖列传》将具体地域的自然环境与其民情风俗联系起来，如“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③“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④司马迁将地理环境与民情风俗相联系的论述方法为后世所遵循。如《汉书·地理志》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⑤是书还曾具体论述：“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精急，高气势，轻为奸。”^⑥又如朱熹亦云：“（魏）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⑦“（唐风）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⑧再如唐顺之亦曰：“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故其陈之则足以观其风，其歌之则足以贡其俗。”^⑨

地理环境影响了民情风俗，也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地理环境—作家—文学作品的影响关系，古人也曾给予清晰的勾勒。《礼记·乐记》：“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① 左丘明：《国语·鲁语下》，引文见《国语集解》，徐元浩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4页。

② 参见陶礼天《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读〈货殖列传〉》，《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第30—36页。

③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0页。

④ 同上书，第3265页。

⑤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⑥ 同上书，第1656页。

⑦ 朱熹：《诗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⑧ 同上书，第45页。

⑨ 唐顺之：《东川子诗序》，《荆川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① 此处的“物”，可以理解成是外界的自然环境，因物而感，故形于“声”，那么，也可以因物而感，形于文学作品。正如钟嵘所言“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②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咏。”^③ 的确，在自然环境中，“物色相招，人谁获安”^④，所以作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⑤，自然环境的变迁往往激荡着作家的心灵：“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⑥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⑦ 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作家心灵的影响感荡，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之一。

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作家的性格、心理、气质与审美好恶的影响自然不同，故而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风貌也有所差异。据此，古人形成了以地域区分文化—文学的视角。如《诗经》十五国风的分类，即是这种地域文化—文学视角的体现。又如班固《汉书·地理志》划野分州，兼及水土风气与民间习俗的关系并证以《诗经》。如：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⑧

班固揭示了地理环境及其地的风俗民情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后代

① 《礼记·乐记》，引文见《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7页。

② 钟嵘：《诗品注·总论》，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③ 同上书，第1页。

④ 刘勰：《文心雕龙注》卷十《物色第四十六》，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⑤ 刘勰：《文心雕龙注》卷六《神思第二十六》，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页。

⑥ 陆机：《文赋》，《文选》卷一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0页。

⑦ 陈延杰注：《诗品注·总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⑧ 《汉书·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4页。

论者延续了班固的思路。如汉末曹丕言徐幹“时有齐气”。^①《文选》李善注解释道：“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②徐幹为齐人。而在古人看来，“齐气”向为舒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公子札来观周乐，乐工“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服虔注：“泱泱，舒缓深远，有大和之意。”^③《汉书·朱博传》：“齐郡舒缓养名。”颜师古注：“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声名。”^④《论衡·率性》：“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⑤庄岳，齐街里名。齐地的舒缓风俗，也影响了作家的个性与文学风格。朱熹亦言：“某尝谓气类近，风土远。气类才绝，便从风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来皆做出婺州文章，间有婺州乡谈在里面者。如吕子约（祖谦）辈是也。”^⑥朱熹认为，影响文章风格的主要有两种因素：一是作家自身的气质，二是地域文化环境。而吕祖谦文风的变化与婺州的地域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刘勰也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及其作品风格有精到的论述。《隐秀》篇：“朔风动衰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⑦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其在《物色》篇中提出了“江山之助”的重要概念：“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⑧刘勰指出了楚国江山景物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帮助之功，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作用与影响。刘勰的“江山之助”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学重要的理论命题，得到了后代学者、作家不约而同的响应。如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即言：“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有论者亦以为唐代张说，“既谪岳州，而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助。”^⑨宋

①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五二，第720页。

② 同上。

③ 《左传》，引文见《史记》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52页。

④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朱博传》，第3400页。

⑤ 王充：《论衡·率性》，引文见《论衡校释》，黄晖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页。

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论文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5页。

⑦ 刘勰：《文心雕龙注》卷八《隐秀第四十》，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2页。

⑧ 同上书，第694—695页。

⑨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0页。